

海关开展跨境电商出口(B2B)试点

本报讯 近日,北京宏远到贸易有限公司去往日本的首票跨境电商电子商务企业对企业(B2B)出口货物,由北京海关所属首都机场海关验放离境,标志着北京市跨境电商新业态发展正式迈入企业对企业(B2B)阶段。

6月12日,海关总署发布《关于开展跨境电子商务企业对企业出口监管试点的公告》,明确自7月1日起在北京、天津、南京等10个直属海关进行试点。7月1日上午,北京海关关验放跨境电商B2B

出口报关单、申报清单21票,货值27.7万元,主要商品为纤维布、拉力带、服装、智能手表、蓝牙耳机、滑板车等。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表示,近年来,作为新的外贸业态,跨境电商零售出口蓬勃发展,为中小微企业开拓海外市场、吸纳和稳定就业发挥了积极作用。2019年,跨境电商零售出口总额同比增长60%。今年前5个月,跨境电商零售出口逆市增长,同比增长12%。

(杜海涛)

解锁稳外贸稳外资新技能 中国掏出四把金钥匙

开启全球复工复产的动力源

■ 本报记者 张凡

2020年上半年已经过去,但疫情仍然在全球蔓延,总确诊人数已经突破1000万。摆在世界各国面前的是4道难题:如何兼顾疫情防控 and 恢复经济、如何推出宏观政策、如何稳定供应链产业链、如何借力新动能。这些难题令全球复工复产路途十分曲折,推动世界经济恢复增长任重道远。

对此,中国掏出四把金钥匙——精准管控、扩大内需、畅通循环、创新驱动。

练就一种能力:精准管控

“放眼全球,中国推进复工复产所取得的成果是一个亮点。因为我们看到,在世界其他市场,企业依然面临着随时停工的风险。”中国欧盟商会主席伍德克(Joerg Wuttke)在接受《中国贸易报》记者采访时高度评价中国复工复产成果。

在稳外贸稳外资方面,复工复产可谓立竿见影:自4月开始,我国外贸出口恢复增长,4月当月出口增长8.2%,5月虽有回落,但依然增长1.4%;在吸引外资方面,5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7.5%……

诚如伍德克所言,在全球范围内,中国率先控制住疫情,虽然吉

林、北京等地偶有反弹,但通过快速、精准、有力的防控措施,疫情很快得到遏制,复工复产的节奏并未被打乱。

联合国贸发会议资深经济事务官员梁国勇认为,严格的疫情防控措施是复工复产的基本前提,强大的防疫物资生产能力是大规模复工复产的基础,政府有针对性地推出政策举措,有效减少了企业压力。

我们看到,中国采取群防群治措施的同时,大数据等创新成果也应用到疫情防控中,令随时掌控并切断疫情传播渠道成为可能;中国的体制优势,保证了各方既能坚持全国一盘棋,也能按照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领域的风险高低程度,精准化、差异化把控复工复产进度。

“这对政府动员能力和执行能力是一个考验。”国际贸易中心咨询专家毛天羽说,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制造业基地,中国复工复产对于全球产业链恢复意义重大,疫情防控经验值得各国效仿,“国外企业也应该严格按照各国政府的要求,有序组织复工复产,同时做好随时应对疫情反复的准备。”

复工复产事关经济增长,练就精准掌控、“收放自如”的能力则是

我国最终战胜疫情、实现社会经济发展的底气所在。

伍德克表示,当下十分期待中国采取进一步措施,以持续提升外企在华经营的信心。他希望有关方面能帮助或允许在华外企接回在国外滞留的高管、专家等工作人员,以帮助企业实现今年的增长和就业目标。

开出一剂药方:扩大内需

6月28日,在中国铁建重工集团长沙第一产业园的厂房内,一台直径达15米级的盾构机的刀盘正在缓缓转动。这标志着该公司今年15米级以上超大直径盾构机系列订单中的首台设备成功下线。

中国铁建重工集团掘进机研究院设计院工程师范瑞强介绍说,今年下半年还将出厂两台15米级的超大直径盾构机,这批产品都将用于国内重大工程项目。

这些单价动辄千万元甚至上亿元的大家伙,充分彰显出“两新一重”建设对我国扩大内需起到的重要作用。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围绕扩大内需还提出了推动消费回升、扩大有效投资、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加快落实区域发展战略等一系

列措施。

这让外企看到在华发展的新机遇。美国荣鼎咨询集团发布的最新报告称,外企对民企的并购交易在过去18个月达到10年来前所未有的规模,因为美欧企业在疫情期间仍日持续看好潜力巨大的中国消费市场。

今年3月,美国公司嘉吉在中国的40余家工厂就已全部复工复产。6月30日,嘉吉安徽滁州工厂推出面向中国市场的植物肉品牌“植启”。

“植物肉产品能满足中国消费者对素食、对健康食品的需求。”嘉吉蛋白中国总经理陈冕表示,“嘉吉将借助全球范围内的研发专长和供应链优势,持续为中国客户和消费者提供安全、负责、可持续的蛋白产品。”

为了进一步激活和扩大国内需求,政府出台多项政策支持外贸企业出口转内销,外贸企业纷纷响应。今年“618”期间,仅天猫平台6月1日当天数据显示,外贸转内销商家成交金额同比增长66%。

无论是专家学者,还是业界人士,都认为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可以把疫情和外部环境带来的影响降到最低限度,将有力推动我国经

济恢复增长。

“无论是消化受阻的外贸还是持续吸引外资,内需都扮演了重要角色。”中国计量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隋月红认为,扩大内需的着力点,除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还须考虑全方位开放,构建国际国内双循环。

走出一步妙棋:畅通循环

6月29日,中俄两国第一条保税区位点对点班列(淄博—乌里扬诺夫斯克州)满载着玻璃制品、机械设

备、轮胎等产品成功开行。乌里扬诺夫斯克州州长莫洛佐夫对此十分高兴:“这次点对点班列的开行,将为中俄贸易打开一条全新的安全、高效、便捷的物流线路,可让中国产品销往俄罗斯乃至整个欧洲市场。”

为畅通国际供应链产业链,中欧班列功不可没。今年一季度,中欧班列开行列数、送货标箱量,同比分别逆市大增15%和18%,大批防疫物资和生活用品源源不断地输送到沿线国家。现在,许多中间产品及最终成品通过铁路等运输方式在各地

各地区流通。

(下转第2版)

“来自中国的‘输血’给我们增添了信心”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许多困难,在日中资企业一方面在确保健康安全前提下积极复工复产,另一方面积极向日本各方伸出援手,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中资企业的高度评价,得到了日方的衷心感谢和高度评价。

青山一道,风雨同担

随着疫情在全球范围内扩散,日本国内的防疫形势也日趋严峻,口罩等防护物资紧缺。据记者了解,为了尽己所能向日方伸出援手、传递温暖,建设银行东京分行在总行的统一部署下,通过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向东京都综合防灾部及在日留学生共捐赠10万只口罩,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为当地防疫工作助一臂之力。其中5万只口罩是运用建行智能撮合综合服务平台采购的。该批物资由境内分行全程协调、保驾护航,在两国海关严守关口且航班紧张的情况下,自4月3日订货到收货仅用了4天时间,抢在东京进入“紧急状态”前送达。

疫情期间,建行东京分行积极与日本三井住友银行撮合平台“Biz-Create”对接,争取资源共享、合作共赢。通过两行间撮合平台的信息互联互通,短时间内为日方企业和机构寻找到中国货源,促成中日两国企业近500万元的医用物资成交。建行东京分行还积极邀请日本客户参与第127届线上广交会,让本地客户体验中国不断创新的跨境推介平台和交易模式,帮助企业寻找商机,并做好配套金融服务。

记者从中国贸促会驻日代表处了解到,在该代表处的协助下,在日中国企业在做好自身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主动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为日本人民疫情防控工作贡献力量,展现了中国企业的担当。中资企业向日本医疗机构、地方政府、养老机构、合作伙伴等捐赠了防疫物资。除此之外,代表处还对接国内资源,

联系了一批口罩、防护服、抗体检测试剂、呼吸机、小型方舱等医疗物资出口企业,积极向日本贸易振兴机构、中日经济协会等对口机构及日本三菱商事、阪急阪神株式会社等日本企业进行推介,帮助日方机构从国内采购防疫物资。

据中国国际航空公司日本支社社长冯立介绍,作为中国唯一载旗航空公司,国航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在日本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及时主动将一批批防疫物资运送到日本各个需要的地方,深刻诠释了“守望相助,共渡时艰”。在中国疫情严重的时候,国航日本支社协助东京都政府、广岛大学医院、日本舞鹤市政府、群马县日中友好协会、创价学会国际涉外局、日中友好文化交流促进会等近20家政府机关、民间机构、当地华人华侨团体及企业个人住北京、武汉、南昌、大连、浙江等地运输口罩、防护服和护目镜等救灾物资近170吨。

中企善举,助力抗疫

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对在日中国企业协会捐赠防疫物资的善举表示感谢。他表示,在当前疫情还未得到有效控制、日本医疗资源严重缺乏的情况下,这样的公益行为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不仅有助于日本地方的实际防疫工作,更体现了在日中国企业对日本防疫工作的支持和帮助。

东京都厅综合防灾部防灾对策担当部长樱园弘接收5万只捐赠口罩时,对中方在关键时刻伸出援手表示诚挚感谢,并表示在当前日本口罩普遍紧缺的情况下此次捐赠尤为珍贵,更是中日友好的证明。希望能与中方加强交流,共同早日战胜疫情。千叶县成田市市长小泉一成表示,中国贸促会驻日本代表处和在日中国企业协会在危难时刻及时出手援助,充分体现了两国友好、风雨同舟的精神。

(下转第2版)



今年以来,山东省荣成市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能源汽车产业疫情期间不停产,全市名骏、康派斯等新能源汽车龙头企业抓紧生产出口订单。据悉,荣成市房车产量占全国的33%,居全国第一,是国内最大的房车产业集聚区和出口基地,产品销往澳大利亚、韩国、美国等10多个国家及地区。图为荣成市名骏房车生产车间,工人正在抓紧组装双轴电动拖挂房车,确保海外订单按期交货。

中新社发 杨志礼 摄

中贸时评

出口管制绝不是“灵丹妙药”

■ 本报特约评论员 荣民

条款既是一项成员自决的权利,也是受客观条件限制的权利。WTO成员运用这一贸易工具受国际法善意原则约束,受这类条款规定的适用范围、特定情况和条件限制,受多年来在成员间形成的适用这一规则的惯例限制。WTO规则体系允许成员为维护基本安全利益采取某些贸易限制措施,但WTO也有权就成员是否善意、合法地适用安全例外条款进行审理和裁判。

近年来,一些国家动辄以“安全例外条款”为由采取包括出口管制在内的举措所引发的负面效应不仅影响本国经济贸易,也影响措施对象国的经济贸易和双边经贸关系的平稳,更对全球贸易的秩序平稳和贸易规则的有效执行与遵守带来冲击和破坏。

无论是近期一些国家对防疫物资采取的各类贸易限制措施,还是去年7月,日本以“围绕与韩国相关的出口管理发现不妥事例”等为由,

对韩国3种半导体材料加强出口管制并将韩国剔除出在安保出口管理上设置优惠待遇的“白名单国家”所引发的日韩贸易争端,再到近期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将华为公司和中兴通讯列为国家安全威胁而采取出口管制措施等,事实一次次表明,在本应以自由化和便利化为关键词的国际贸易领域强行采取包括“出口管制”在内的各类贸易限制措施,是对市场原则和公平竞争的破坏,是对国际经贸基本规则的漠视,更是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严重威胁,在违背WTO自由贸易原则的同时也降低了全球资源配置与利用的效率,扭曲了世界市场的公平与价格体系,更会在损害措施对象国利益的同时让自身利益受损,更可能殃及第三国的利益。

伴随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过往把出口管制等作为管理对外贸易的经济手段和针对不同国家实行差别待遇与歧视政策的政治

工具的功能本已逐渐弱化,各国的出口管制有所放松,特别是出口管制政治倾向有所减弱。在疫情冲击的背景下,一些国家,特别是发达经济体重新拾起出口管制这个“大棒”,自以为是从地地采取各种贸易限制措施作为“灵丹妙药”,意图在实现自身经济贸易的平稳运行时能够“独善其身”,实际上是“以邻为壑”的损人不利己的贸易保护主义行为。对于那些基于国内政治需要或者政治打压目的采取出口管制等措施的国家来说,就是对WTO“安全例外条款”的肆意滥用,是对多边贸易规则体系的严重践踏,是对国际贸易秩序平稳有序的人为破坏,可能带来更多国家无视WTO规则而在贸易管制问题上恣意妄为的连锁效应,这将对多边贸易体制最致命的伤害,更会对疫情背景下需要借助稳定全球产业链与供应链来加速恢复的国际贸易秩序带来灾难性冲击。

编辑:周东洋 联系电话:010-64664888-2057
制版:耿晓倩 E-mail:maoyibao1@163.com

本报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
赵继明 赵继云 律师
电话:010-62684388

